

《帕梅拉》中的帕梅拉形象解读

胡鑫,石嘉璇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帕梅拉》中的女性主人公帕梅拉的人生经历可解读为三个不同阶段,通过分析其形象由反抗到妥协的变化以及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认为帕梅拉虽然有反抗的一面,但其形象实际上仍然是英国传统的女性形象。小说作者理查逊通过描述帕梅拉反抗以及顺从的两种形象达到其说教目的,表达了理查逊提倡遵守传统道德观念的主张。

关键词:塞缪尔·理查逊;《帕梅拉》;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84(2014)03-0172-03

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是18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与笛福、菲尔丁一同被誉为英国现代小说奠基人。理查逊的作品多以女仆或中产阶级女性为主人公,以婚姻道德问题为主题,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开创了现代感伤主义文学的先河。在18世纪,许多作家已经认识到书信形式有利于表现主人公的内心情感。理查逊作为第一个单靠书信格式来完成整部小说的作家,其首部作品《帕梅拉》(《Pamela》)用书信“系统地刻画人物性格并揭示深层心态”^[1],使其被称为“探求展现作品人物从内心发展、变化方式的现代小说先驱”^[2]。该小说于1740年11月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评论界对小说主人公帕梅拉的评价褒贬不一。纵观全文,帕梅拉的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帕梅拉的形象呈现出变化。本文通过分析帕梅拉这一女性人物在不同阶段由反抗到妥协的变化,探讨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认为帕梅拉虽然有反抗的一面,但其形象实际上仍然是传统的女性形象。

1 反抗的女性形象

《帕梅拉》^①记载了帕梅拉婚前和婚后的生活经历。婚前的帕梅拉自尊、自立、自强,为保住贞洁,她与主人B先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年仅15岁的帕梅拉在致父母母亲的信件和私人日记中讲述自己如何抵制其主人B先生的引诱和威逼,捍卫自己的贞洁,最后得到回报。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不少哲学家认为男人代表理性,而女人代表感知。因此,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的理论把妇女排斥在道德以及理性领域之外,认为她们“性情多变,缺乏头脑”^[1]。此外,由于18世纪之前的英国一直处

于父权制度为社会总秩序的男权社会中,男性在整个社会秩序中处于掌控者的地位,女性在这种社会模式中只能成为被男性统治的对象,因此受制于男性的命运便是当时女性不可改变的事实。在帕梅拉的眼中,一位未婚少女的贞洁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要可贵,因此她为自己能拥有这一可贵的东西感到骄傲与自豪。然而面对B先生的种种邪恶与诱惑,帕梅拉一次又一次地诘问这个世界的现状,“啊亲爱的父亲,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啊。”(133)历经曲折和坎坷之后,帕梅拉得出“这是个邪恶的世界,人们向这些歪风邪气屈服让步,并以这类事情频繁发生为理由,来原谅他们没有做出努力来纠正这类事”(160)。

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帕梅拉正是这样一位身处18世纪不堪父权制度重压而奋起反抗的女性形象。凉亭事件中,当B先生的邪恶企图首次暴露在帕梅拉面前时,虽然帕梅拉深知自己地位卑微,不能与B先生抗衡,帕梅拉依然选择反抗。在小说中,B先生对帕梅拉说话时语气傲慢。可以看出,帕梅拉是一位没有任何地位的女性,她想做什么或不想做什么都不是她自己所能主宰的。帕梅拉试图通过自己的言语来反抗,但是作为主人和贵族阶级的B先生明确地告诉帕梅拉这样和他说话不符合社会道德。在B先生看来,帕梅拉的言行举止完全违背了其所处的阶级地位,理应受到指责。然而对于帕梅拉而言,这种阶级和性别上的不平等成了她反抗的根源。她不满当时社会种种不平等,认为富人们对“穷人们的贞洁似乎根本不当一回事”,“现在女人拒绝男人,比女人依从男人,成为更为奇异的事情了。”(75)正是如此,帕梅拉被人们

收稿日期:2013-10-26

作者简介:胡鑫(1989-),女,湖南常德人,硕士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 书中所有《帕梅拉》的引文,均引自塞缪尔·理查逊《帕梅拉》,吴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随文只注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视为“冒失鬼”,是个“胆大妄为”“不知好歹的人”(75)。按照当时人们普遍的观念,如果一个上流社会的男人毁了一个女佣的贞洁,只需要给她点补偿,因而这也是B先生一直认为帕梅拉小题大做,称她为“虚伪的小东西”的原因(31)。小说里提到的另一位名叫西蒙爵士的贵族先生面对帕梅拉的求助,不但没有给予实际的帮助,反而冷嘲热讽地说道:“哎呀,我亲爱的,这算得了什么呀,只不过是我的邻居看上了他母亲的侍女罢了!如果他注意照看,那他就什么也不会缺少,我看对她不会有有什么了不起的伤害。他做这种事情并不危害其他任何家庭。”(158)。在帕梅拉所生活的时代,几乎没有人会主动同情她的遭遇,人们对小说中男主人B先生的行为习以为常。

除了言语的反抗,帕梅拉还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抵制B先生的威逼利诱。自从B先生的邪恶企图暴露之后,帕梅拉苦苦哀求B先生解除其主仆关系,以便以贞洁的身份回到父母身边。狡诈的B先生表面上答应派马车将帕梅拉安全地送到父母身边,但暗地却买通马夫,将帕梅拉送至另外一处宅第林肯郡宅。林肯郡宅的女管家朱克斯太太对帕梅拉的态度更是糟糕,她把帕梅拉比喻成“小羊羔”(233),可以任意地欺凌和处置。面对痛苦的囚禁生活,帕梅拉坚持给父母写信,求助于牧师威廉先生,她无时无刻不在策划着自己的出逃计划。在林肯郡宅的第28天,帕梅拉在信中描述了自己悲惨的逃跑经历:先是偷出钥匙,决定从后门逃走,但是精明的朱克斯太太把锁更换;于是帕梅拉决定翻墙,但是由于墙已老旧,最后帕梅拉不仅没能逃走,反而摔得遍体鳞伤。面对B先生随时都可能得逞的邪恶行为,帕梅拉用尽自己的力量与之抗衡。虽然写信、晕厥、逃跑、求助等一系列的反抗均以失败告终,但是她保持贞洁的信念从未改变过。

2 妥协的女性形象

面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帕梅拉选择奋起反抗,但是生活留给她更多的是无奈与失望。因此18世纪的英国女性要想在社会中获得自由的生存空间和平等的社会地位实属不易。首先,等级森严的社会阶级制度使得女性的反抗无足轻重。一直以来,女性在社会中属于弱势群体,因此女性服从男性被看作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就主仆关系而言,仆人对主人的绝对服从更是理所当然。以往,在英国社会大多数女性受教育程度不高,只有上流社会的女性识文断字。因此,理查逊笔下的帕梅拉是一位“不是女仆的女仆”^[3],因为与普通的仆人相比,帕梅拉不仅拥有美丽的容貌,并且知书达理。此外,帕梅拉还拥有唱歌、跳舞、刺绣、吟诗等才能。尽管帕梅拉与众不同,其作为仆人,对主人毕恭毕敬是她不得不遵守的行为准则。面对B先生的调戏和侮辱,帕梅拉坚持反抗,但反抗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B先生明白地告诉帕梅拉“你是在和你自己为敌,你刚愎自用的傻念头将导致你的毁灭”(25)。B先生表示帕梅拉的反抗无济于事,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自我毁灭。同样,当帕梅拉问及杰维斯太太“如果您处在我的地位,您会怎样想或怎样做”,得到

的回答却是“我不知道我应当怎样想或者怎样做。我希望我应当像你那样做,但是我知道其他人都不會那样做”(37)。小说中,杰维斯太太是一位善良的管家,为了保全帕梅拉的贞洁,甚至不惜丢掉自己的职务,深得帕梅拉的尊重和信赖。然而,杰维斯太太的言语中反映的仍然是仆人应该绝对顺从主人的道德观念。杰维斯太太认为帕梅拉与主人B先生的对抗不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由此可见杰维斯太太对帕梅拉这种有悖于社会主流道德准则的行为颇为不满。同样,当帕梅拉和B先生展开激烈的争吵时,杰维斯太太斥责帕梅拉“不要对先生没有规矩,你应当知道你们之间的距离”(31)。与帕梅拉一向友好的杰维斯太太此时也斥责帕梅拉对主人的无礼,因为维护主人的地位是仆人们应尽的职责。

除杰维斯太太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背叛帕梅拉的信使阿诺德,欺凌帕梅拉的朱克斯太太等所有的人物都对帕梅拉的反抗表示不解,都奉劝帕梅拉不要反抗主人,提醒其遵守仆人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于是帕梅拉只能感叹“我现在除了写信、哭泣、忧虑和祈祷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107)，“当有权有钱的富人决心进行压迫时,悲惨不幸的穷人们能对他们反抗什么呢”(108)。显然,在权利和地位不平等的社会中,帕梅拉这一普通女性的意志必然无法与来自统治阶级的B先生们抗衡。

其次,父权制下生活的帕梅拉由于受到自身传统观念的困扰,也使其反抗蒙上无奈的色彩。帕梅拉是一位多重矛盾中的“美德楷模”^[4],虽然她有着挣脱父权制压迫的思想观念,但是由于受到所属时代的束缚,帕梅拉的形象也被深深地打上了传统女性形象的烙印。为了自己的贞洁,帕梅拉勇于反抗B先生的威逼利诱,但是更多时候帕梅拉却在反思自己这种违逆主人的行为是否合适,自己卑微的地位是否有资格与高贵的B先生抗衡。当B先生质问帕梅拉是否将凉亭事件告诉杰维斯太太时,她焦虑地回答主人“我跟先生辩论是不合适的”(24)。此外,帕梅拉还多次提醒B先生两人之间身份悬殊。这些言语一方面可视为帕梅拉为躲避B先生的调戏而做出的申辩,但更多程度上是帕梅拉作为一个传统女性的观念的表达。通过帕梅拉与B先生的交流可以看出,帕梅拉对身份地位很是在意,她时刻遵守着身份卑微的仆人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

同样,出逃失败之时的自白也体现出帕梅拉的无奈。日记中帕梅拉写道“没有留下任何希望,我苦心构思的所有计划都已经彻底失败了”(203)。因为出逃计划的失败,帕梅拉不但没能成功逃跑,反而摔得遍体鳞伤。这时的帕梅拉十分悲观失望,无奈地感叹:“除了投身到池塘里,结束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感到的恐怖,我还能做什么呢?”(203)面对出逃的失败,帕梅拉除了失望,还懦弱地担忧自己未来的生活。帕梅拉在给父母的信中提及:“如果我真的能从后门逃出来,那时我就会像现在一样,既没有钱,又没有亲友,而且又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那么谁知道我的情况究竟会不会比现在好些呢!”(209)即使能成功出逃,帕梅拉依然质疑自己的生存能力,她担心自己没

有钱,没有亲人,在陌生的地方不能生活下去。归根结底,帕梅拉害怕自己一无所有,害怕生活没有依靠,因此心中矛盾重重。

3 帕梅拉形象的实质

当种种邪恶的企图都遭到反抗之后,最初只是抱着对帕梅拉游戏一番的B先生最终被帕梅拉的贞洁的品德感动,B先生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迎娶了身份卑微的女仆帕梅拉为妻。正如故事的副标题所言,帕梅拉的贞洁得到了回报。然而,帕梅拉的贞洁所得到的回报仅仅只是贵族阶级的B先生明媒正娶了她,婚后的她依然是过着传统女性的生活,遵守妇女生活中的条条框框,其与B先生“夫妻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主奴关系”^[5]。婚后的她会时时思考自己卑微的身份是否配得上高贵的B先生,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会给B先生丢脸,以及B先生是否会因为娶了自己而受到粗鲁无礼的嘲笑等等。日记中,她反复提到“除了配不上外,我不害怕任何事情,也不忧虑任何事情”(326)。不仅如此,帕梅拉甚至还常常自我反省并承认自己曾经的反抗是个错误,认为自己“曾产生了一层寒冷的冰霜,知道您对我的盛情厚意融化了这层冰霜,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先生请原谅我吧”(319-320)。日常生活中,帕梅拉对B先生更是毕恭毕敬,说话时使用的词语都非常谦逊得体,例如“如果您允许,我将……”这样的言语在日记中多次出现,甚至有时生活中需要做出一些决定时,帕梅拉的意见转变为“你的意愿就是我的意愿”(325)、“我一切听随他决定”(325)。总之,婚后帕梅拉全部的生活都是以丈夫为中心,完全服从丈夫旨意和意愿,唯恐自己会出现任何差错。与婚前那个勇于反抗主人邪恶企图的帕梅拉相比,婚后帕梅拉象18世纪其他女性一样被动、顺从、温和、优雅^[6]。

帕梅拉形象的转变代表了女性向传统的父权制妥协。帕梅拉的妥协不仅源于自身传统观念的影响,同时也是时代束缚的结果。虽然经济迅速发展,18世纪的英国在宗教方面却日益衰败,世风每况愈下。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也严重地威胁着英国传统的价值体系、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1740年前后,道德改良运动高涨,对于如何引导人们遵守传统的道德规范、重振传统美德无疑成为道德家们的当务之急。作为传统道德的忠实维护者,理查逊理所当然也担任起了重振传统道德的大任,他“不但宣讲道德规范,更关心如何让读者接受他的劝善”^[7]。因此,理查逊笔下塑造的帕梅拉的形象可视为理查逊道德观念的宣扬,小说中“发布的操行指南言论不仅是对女性思想和行为的指导规定或(如某些女权主义者所强调)压制女性的新策略,而且也是整个中产阶级界定自身新身份的努力,是他们自我塑造、自我提升并全盘革新道德规范的宏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8]。理查逊本人也曾宣称他写小说的目的“不在于愉悦读者而在于教育他们”,在于保障“人类社会的纽带”^[8]。

《帕梅拉》为女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路标

便是小说塑造的女主人公”^[9]。理查逊通过描述一个反抗的帕梅拉和一个顺从的帕梅拉来提醒18世纪英国社会的女性,具有反抗意识会使生活痛苦不堪,女性只有恪守传统的道德准则,幸福才会随之到来。正如伊恩·P·瓦特在其著作《小说的兴起》中指出,“就父亲的权威和作为一种道德和宗教统一体的家庭组织的极端重要性而言,他(理查逊)本人是坚定地站在传统一边的,相反,他的小说却倾向于那种个人挣脱家庭羁绊的主张。”^[10]这说明小说中塑造的女性主人公帕梅拉的反抗充其量只是在描述社会中存在的少数现象,理查逊真正要表达的依然是遵守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只有这样,女性所做出的努力才能得到回报。

4 结语

通过解读帕梅拉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反抗与顺从的不同形象,可以看出帕梅拉依然是英国传统妇女中的一员。帕梅拉这一由反抗到妥协的女性形象暗含了理查逊创作这部小说的说教目的,帕梅拉最后的顺从者形象才是女性的正确选择。小说中,帕梅拉的反抗只是其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其无力改变父权社会制度下妇女地位低下的社会现实,也无法摆脱女性传统思想的困扰,因此帕梅拉最终走向妥协。

参考文献:

- [1] 刘意青. 英国18世纪文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 [2] Doody M. Samuel Richardson: Fiction and Knowledg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vel. Ed. John Richetti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 [3] 刘戈. 《帕梅拉》与十八世纪中产阶级的政治理想[J]. 名作欣赏, 2007(12): 114-118.
- [4] 胡振明. 多重矛盾中的“美德楷模”——《帕梅拉》中的对话性[J]. 外国文学研究, 2007(6): 150-156.
- [5] 陈栩. 从布衣平民到缙绅贵妇——《帕梅拉》服饰政治的解读[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6): 549-552.
- [6] 王晓焰. 18-19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7] 朱卫红. 贞洁·美德·报偿——论《帕梅拉》的贞洁观[J]. 外国文学研究, 2006(4): 84-89.
- [8] 黄梅. 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9] 苏耕欣. 意识形态的诱惑——评里查逊与奥斯丁小说中的女性人物描写[J]. 国外文学, 2002(4): 70-80.
- [10] 伊恩·P·瓦特. 小说的兴起[M]. 高原, 董红钧,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责任校对 王小飞)